

<https://doi.org/10.53106/199356332025123803005>

窺見幸福：從能動性探究新二代的適應議題

黃騰*



臺灣新住民及其子女已成為臺灣社會中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如何協助他們適應臺灣社會，已成為政策的重要議題。但是，過去相關的移民社會政策，多半是以客觀或主流社會標準來衡量，無法反映其主觀的生活經驗與意義。而且新二代與第一代新住民的狀況差異甚大，卻很少有相關的研究。故本研究從主觀幸福感的角度，回到強調賦權的能動性基礎，聚焦在母親為越南及印尼的新二代大學生，探討社會位置對其學校與家庭生活中的影響。本研究共邀集 12 位就讀北部大學的新二代參與者，主要採敘說研究法。研究發現，新二代獨特的社會位置會令其產生身分隱藏的現象、扭曲其家庭關係、或對其身分採取工具性的行動策略。從生活適應來看，其身分隱藏也常成為其學校適應的策略，但就算物質層面或成就表現的生活是滿意的，其內在卻常感到自我的不完整性。因此，如何協助新二代發展更完整的自我，應納為相關學校及社會政策的重要考量。最後，本研究亦建議未來的社會政策，應從多層次的動態發展來思考新二代的社會位置如何影響其主觀幸福感，並從單向適應改為雙向適應的政策思維。

關鍵詞：主觀幸福感、個體化、能動性、新移民、學校適應

*黃騰：輔仁大學師資培育中心特聘教授兼教育與運動健康學院院長
(通訊作者：diinesh0120@gmail.com)

Glimpsing Well-being: Exploring Adaptation Issues of the Second-Generation of New Immigrants Through the Lens of Agency

Teng Huang*

New immigrants and their children have become an increasingly significant force in Taiwanese society, making their adaptation to Taiwan society a crucial policy concern. However, previous social policies on immigration have largely been evaluated through objective or mainstream societal standards, which fail to reflect the subjective life experiences and meanings of these populations. Moreover,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second generation differ greatly from those of first-generation immigrants, yet related research remains scarce. Grounded in the concept of agency and viewed through the perspective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focuses on “new second generation” university students whose mothers are from Vietnam and Indonesia, exploring how their social position influences their experiences in school and family life. A total of twelve participants from universities in northern Taiwan were recruited, and the study adopted narrative inquiry as its primary methodology.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the unique social positioning of the new second generation often leads to identity concealment, strained family relationships, or the adoption of instrumental strategies toward their identities. In terms of daily adaptation, identity concealment often serves as a coping strategy navigating school life. Nevertheless, even when their material circumstances or achievements appear satisfactory, participants often experience an inner sense of incompleteness. Therefore, supporting the new second generation in developing a more coherent integrated sense of self should be a key concern for both educational and social policies. Finally, this study recommends that future social policies adopt a multi-level and dynamic approach to understanding how the social

* Teng Huang: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Center of Teacher Education and Dean of College of Education and Sports Health,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corresponding author: diinesh0120@gmail.com)

positioning of the new second generation shapes their subjective well-being, shifting from a one-way adaptation model to a reciprocal adaptation framework.

Keywords: *agency, individualization, new immigrants, school adaptation, subjective well-being*

窺見幸福：從能動性探究新二代的適應議題

黃騰

壹、緒論

一、新住民第二代在臺灣社會的重要性

臺灣近 30 年經歷顯著的族群結構變遷，隨著跨國婚姻增加，新住民及其子女已成為臺灣社會中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根據教育部（2024），112 學年度全國各級學校的新住民子女（以下簡稱「新二代」）共計 27.8 萬人，占全體學生 6.8%。COVID-19 疫情前，新住民結婚人數每年穩定約 2 萬人，疫情期間則大幅下降，至 110 學年度僅 0.9 萬人，112 學年度回升至 2.2 萬人。在臺灣的跨國婚姻中，除了陸籍配偶，其他主要來自越南、印尼等國家，因此，教育部提到：「新住民子女因受父（母）原生家庭影響，於學習階段所面對之挑戰多高於國人子女，爰應投入適切之教育資源及關懷，以助其於良好之學習環境中成長茁壯」（頁 i）。

新二代和第一代的新住民並不相同。第一代的新住民有著明顯的語言、外貌、文化上的差異，但是，對於這些父親既是臺灣人，又從小生長在臺灣的新二代來說，這樣的差異幾乎是微乎其微，如果沒有被告知，一般人很難區辨其新住民的身分。由於差異甚微，而且可以被隱藏，所以第一代會面臨的問題和第二代可說是完全不同。此外，近年來因為東協國家在全球生產體系的地位上升，以及臺灣南向政策的推動，於是新住民族群轉眼又從「社會問題」提升為「社會資產」（夏曉鵬，2018）。這些社會大環境的改變，究竟對這些新二代有著什麼樣的意義呢？由於過去針對新二代的相關研究並不多（黃騰，2022），因此顯得我們對新二代的政策進退失據。

二、傳統新住民政策的限制：從客觀標準到與主觀幸福感

回顧過去數十年來臺灣針對新住民的政策，通常多以第一代外籍配偶為主要對

象，且往往採取分配正義等偏向物質或福利方面的補償政策（戴台馨，2012）。儘管 2024 年 8 月公告《新住民基本法》，正式將新住民子女納入新住民政策的範圍（內政部，2024a），但目前大多均只能從既有的新住民政策來思考未來針對新二代政策的可能發展。過去的新住民政策涵蓋適應輔導、醫療保健、就業權益、教育文化、子女教養、人身安全以及法令制度等面向，其目標在於協助新住民在客觀生活條件上達到一定的水準，例如改善其受教環境、提供就業機會等，其背後預設的是，只要這些客觀指標獲得提升，個人的生活品質便能隨之改善（戴台馨，2012）。

然而，這種以客觀標準思考新住民政策的觀點受到諸多學者的挑戰。長期著墨在移民政策研究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Sen（2008）就從「能動性」的角度來思考新移民的「主觀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2013）對主觀幸福感的定義為：「良好的心理狀態，包含人們對其生活所做的各種正負面評價，以及人們對其經驗的情感回應」。主觀幸福感一開始主要來自早期「幸福感」使用的「Happiness」概念，但是，這個概念很容易被很多人理解為享樂主義，但許多文化顯然不認為幸福只等於快樂，而且通常快樂是短暫的，並不是比較長期和持續的幸福感。由於早期這個概念過於籠統，不論在翻譯或者測驗中，都無法有穩定的結果，因此後來在眾多學者的討論下，才形成目前比較有共識的「主觀幸福感」用詞（OECD, 2013）。這個詞主要包含三個面向：情感面（affective）、生活滿意度（life satisfaction）、意義感（meaningfulness）（Durand & Smith, 2013；Stone & Mackie, 2014）。正因為主觀幸福感強調幸福感是一種基於個體意義的主觀評估，因此 Sen 指出，單純從客觀物質層面或福利措施來評估移民的生活狀況，往往忽略了他們主觀的感受與需求。因此，針對新住民第二代的主觀看法進行探討，對於建構一個更好的臺灣移民生活環境至關重要。

貳、文獻探討

一、主觀幸福感與能動性

「主觀幸福感」是當代移民研究的重要方向（Nikolova & Graham, 2020）。這一概念的興起，主要是源自 Sen 的觀點。Sen 於 1998 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原因正是因為他在社會福利相關經濟學領域的傑出貢獻。其理論還影響了全球發展政策，例如聯合國人類發展指數（Human Development Index）還採用其對多元福祉的觀念，並將之納入健康與教育等指標（Anand & Sen, 2000）。因為 Sen（2008）發現，過去的移民研究幾乎偏向關注 Rawls（1999）在《正義論》（*A Theory of Justice*）提出的「基本善」（primary goods）的分配，例如收入、財富、權利、自由等。其想法是認為社會制度的設計應該要透過分配讓所有人獲得「基本善」，因為這些是任何人都想要的資源。

但 Sen（2008）認為，這種概念過於強調客觀標準，不能完全反映個體的生活福祉，因為每個人將這些基本生活物品轉化為良好生活的「能力」並不相同。而 Sen 最特別之處在於，他將「能力」（capability）帶入對社會福利的研究與政策評估。相較於傳統客觀「基本善」為主的分配觀，事實上，個體將這些物品轉化為「好的生活」（good living）的能力各不相同，因此客觀指標並不能適用於所有人（Sen, 1992, 2008）。因此 Sen 強調在移民的政策上，我們應超越客觀物質指標，關注個體將資源轉化為實際生活福祉的能力。

Nikolova 與 Graham（2015）的研究亦指出，儘管各國移民在客觀物質層面上的幸福感可能有所提升，但從主觀幸福感的面向來看，其成效仍不明確。但可惜的是，目前對於能力的研究仍然尚未成熟，還需要持續的探究發展（Graham & Nikolova, 2015）。-而這可能和他們使用量化方式總結式的評估使用能力狀況有關。例如，其中一個的典型量化問題如下：「如果我願意，我可以自由參與影響我生活的政治活動」（Anand et al., 2011）。像這類的研究，主要還是在確認社會結構制度是否有限制這些移民各方面的能力展現。但是，移民對於這些社會制度政策的經驗、觀點與意義又是如何（例如，我可以自由參加政治活動，與我參加政治活動的

意義，其實是兩件不同的事），這方面我們所知仍然有限（Agee & Crocker, 2013）。

事實上，Sen 之所以會提到「能力」，背後正是基於「能動性」的概念。從發展理論的一開始，他就把每個個體視為是能動者（agents），認為我們應該賦予個體參與決策並塑造自身生活的能力，而非僅僅提供資源給他們（Sen, 1985）。Sen 認為，「能動性」的定義就是人們「有能力根據自身價值觀採取行動並影響世界」（Sen, 1999, p. 19）。而人類真正的發展是透過擴展個體能動性實現自由，例如提供教育、健康與民主參與的機會（Sen, 1999）。但 Sen 在對能動性的解讀上，卻也被批判太缺乏「賦權」（empowerment）的面向。例如，在談社會福利指標、能動性與賦權關係時，Ibrahim 與 Alkire（2007）指出，Sen 比較關心的還是作為一個有能力追求自己自由的能動者，但是，Sen 自己也提到作為一個自由的人，仍然會受到社會結構制度的影響。在這方面，他並沒有過多著墨。Archer（2000）也提到類似的看法，認為 Sen 偏向關注實現自由的個體，忽略其所在社會環境的權力關係。Drydyk（2013）也提到，像是這種針對自由個體和能力取向的能動性觀點，常常忽略個體其實是在社會關係下行使他們的能動性，一旦缺乏對社會關係的理解，很容易使能動性這個概念過於空虛。因此，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能動性是無法抽離社會情境的，人的目標與行動並無法脫離社會結構制度的影響。因此，本研究接下來將進一步從社會學「能動性」的概念探討相關移民主觀幸福感研究的可能。

二、新二代的反思與情境：能動性觀點

接續 Sen 以「能動性」作為移民研究的理念，以及目前對於「能力」的有限研究，本研究企圖以 Giddens 的能動性概念作為架構來探討臺灣的新二代議題。一方面不僅呼應 Sen 對當前移民政策過度強調客觀標準和資源的問題，另一方面可以持續深化主觀幸福感取向的移民研究。Giddens 是當代研究能動性的社會學大師之一，以下就 Giddens 能動性概念中「目標、情境、反思」三者的關係論起。

作為一個能動的個體，一個最重要的關鍵就在於他／她有能力對其所處社會情境和個人目標進行反思。所以我們可以把能動性定義為：「在一般情況下，人總是能夠在他所處的社會裡，藉由他的行動，不斷反思調整他的作為達到目標，或者他所期待的有意義生活」（Billett, 2006；Giddens, 1984；Scribner & Tobach, 1997）。就能動性的角度來看，所謂的「目標」總是和個人所在的社會情境和意義有關。例

如，移民如果重視移民之後的工作收入，而因為種種現有的社會結構制度問題而無法像一般公民一樣容易找到工作，畢竟他們可能會有社會觀感、教育程度、語言文化隔閡等差異，這時候對他們有意義的地方就會在於如何取得更好的工作機會和收入。因此，就如 Sen (1999) 所言，如果用分配取向的觀點，就很容易忽略他們在實現工作能力上面的限制。但問題是，這些有意義的目標和反思過程都和個體所在的社會情境有關，而這也是 Sen 沒有過多著墨的地方。所以，透過以下「目標、情境、反思」三者關係的探討，或許能幫我們進一步深化主觀幸福感的研究。

(一)「反思」是提昇能動性和修正政策的關鍵

人們在生活中許多的意義與行動，常常是「不自覺的」，更別說帶著「反思」的成分，因為人們經常依賴的是「實踐意識」(Giddens, 1991)。所謂的實踐意識，這意味著人們可以在行動中實踐出來，但是卻不一定能夠意識到，用言語的方式表達出來。而「反思」很關鍵的地方就在於行動者要能夠有意識地根據自己的目標來詮釋和調整自己的行動。就如研究反思與能動性的 Stein 與 Grant (2014) 指出，自我反思所帶來的「洞察」(insight)，可以讓行動者更釐清內心的想法、情感和行為，而這樣的釐清對於行動者完成目標所需做的改變，是極為關鍵的。回到 Giddens 的說法，也可以說是行動者對自己的活動保持一種「理論性的理解」(theoretical understanding)，他愈是能夠清楚地理解發生的事情，行動能力愈強 (Giddens, 1979, p. 57, 1984, p. 5)。其實近年來的心理學研究，已用量化的方式證實「反思」對行動者完成目標所需做出的改變是極為關鍵的，而且與提升主觀幸福感有正向關係 (Bucknell et al., 2022; Stein & Grant, 2014)。

然而，「反思」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它還具有社會重建的意涵。就如 Giddens (1984) 強調，個體和社會結構之間是一種「開放性的循環過程」，如果個體的反思提升，就能夠對社會結構與制度產生一定的回饋和影響，在這樣的過程中，個體並不是脫離社會存在的，而是能夠藉由反思的歷程，影響個體所在的社會關係和制度結構。在理論和研究上，這代表著一些重要的意義。從理論上來看，Sen 的能力取向較少關注個體與社會的關係。但是從能動性的概念來看，如果我們能夠創造能動者更多的「理論性理解」，那麼就能夠提升行動者的反思或政策的修正，達到增權的效果，故而建議提升其主觀幸福感。

何況，「新二代」是一個非常新的概念，隨著新住民第二代子女的長大，最近的

政策也才開始把新二代納入新住民相關的政策。我們很難用過去的族群關係或理論概念來掌握這種處於多重認同下的新二代，因為傳統的族群研究主要都以特定來源、語言或文化作為基礎（王甫昌，2003），但是，新住民子女在這種混合血緣和文化的基礎上，該怎麼以傳統的族群研究來分類？甚至也有人認為第一代新住民並不是整個家庭移民到臺灣，所以，連第一代新住民都不應該被稱為族群（鐘允國，2017）。因此，現階段本研究先將過去族群研究的概念置於括號，純粹以新二代的身分所產生的相關經驗為主。先著力於掌握新住民子女的日常生活實踐經驗，從中找出可指稱的現象與概念，作為討論和建構的基礎。而從社會學能動性的「反思」概念來看，掌握新二代的實踐知識，正是一個可能的方向。

就移民的政策來看，Agee 與 Crocker（2013）也提醒我們，以政策的預期企圖來看實際的政策結果，常常會有一定的落差。如果我們重視的是新二代主觀意義上的幸福感，那就表示政策的推動過程也應該是一個開放性的循環過程，也就是 Sen（1999）所說的，我們應該賦予個體參與決策並塑造自身生活的能力。因此，本研究將透過敘說的方式引導新二代對其經驗進行反思，這些研究內容因為反映出新二代的生活經驗，所以，臺灣未來的政策也可以參照這些新二代的反思和經驗來進行修正和調整。

（二）情境與社會位置

從能動性的角度來看，人們的行動與反思並不是出現在真空的社會情境下，而總是基於他們對情境的理解。因此，當我們在理解新二代的生活行動時，應該要更能夠理解他們所在的情境，從情境中去理解其行動和反思的意義。因此，Giddens（1979）總是把行動看成是「情境中的實踐」（situated practices），它總是得視情境中的狀況而定。

就如 Archer（2000）所說，我們不該把社會結構與權力從能動性的概念抽離。能動者所處的情境不只是個人的微觀經驗，也可能反映鉅觀的社會結構制度與文化問題。因此，當我們把社會結構權力作為理解社會情境對個人影響的背景時，就「主觀幸福感」的「能力取向」而言，就可以把先前被忽略的社會結構與權力面向帶入，從而加強「賦權」的可能。特別是針對新二代這麼新興又獨特的族群，更需要有更多的研究幫助我們理解其社會情境下的意義與目標。所以，理解新二代在特定「社會位置」的經驗，並不能只從理論或數據上去探討那些存在於新二代之外的

社會事實，而是應該從新二代的「經驗」去理解社會位置對他的影響，因為那才是他／她所知覺的情境，也會反應出他／她的意義與目標。但是，從研究的角度來看，我們很難透過提問：「什麼是你經驗到的社會位置？」來瞭解他們所知覺的社會位置。畢竟，社會位置本身是一個相對他們抽象的學術概念。

那麼從研究的角度，我們又該如何探討社會位置對新二代的影響？或許我們可以透過分析新二代的身體感知或情緒感受來一探究竟。近年來，社會學者逐漸重視身體感知在社會研究中的價值，認為身體感知既是社會規範最主要的承載對象，也是個人與社會連結的重要橋梁（Boler, 1999；Mcveigh, 2020；Van Galen, 2017）。Reay（2005）則提到，過去大部分有關階級情緒的研究都侷限於以個人心理為主的分析框架，未能充分與社會階級理論有效結合。實際上，怨恨、內疚、羨慕、羞恥等情緒，常常發生在具體的階級互動場景中，而我們卻經常忽略。甚至 Reay 認為，情感議題的重要在於，情感不僅影響意識層面的表現，也深入潛意識層次，進而潛在影響社會位置上的行動者。Tanaka（2015）也指出，最新的神經科學研究已表明，情緒感受與個體所在的社會位置緊密相關，因為人與人的互動總是在特定的情境之中，情緒和感受既是人類同理經驗的基礎，也是存在與社會環境互動的過程中。換言之，如果我們要透過情境來瞭解新二代的處境，除了他們能夠言說出來的經驗內容之外，也可以在訪談過程中鼓勵他們表達相對應的情緒感受，這或許也是我們理解他們社會行動情境的重要切入點。

三、以能動性重新思考新二代的「適應」

過去許多國家的移民政策採取「同化」（assimilation）取向，強調移民應放棄原有文化，融入主流社會（Berry, 1997）。但這樣的政策往往忽略文化多樣性的價值與移民的主體性，因為對移民而言，同化常造成語言流失與文化傳承中斷，削弱其在家庭與社區中的文化角色（Kymlicka, 1995；Portes & Rumbaut, 2001）。Berry（1997）還指出，單向的同化策略不利於移民的心理適應，容易造成邊緣化與疏離感，造成幸福感的下降。根據監察院（2018）有關新住民融入臺灣社會議題的報告，許多新住民原本在母國的學歷或專業在臺灣並不被承認，導致這些新住民來臺之後必須從事比較低階的勞力工作。但事實上，移民的工作機會卻對移民是個非常重要的議題（徐敏雄，2011）。

李佳璇（2015）指出，其實新二代也同樣面臨「同化」的問題，我們的學校教

育和社會系統基本上還是以主流社會為主，缺乏對於新二代的多元文化理解。然而，其實「適應」議題才是研究新住民的重要主題，但多半卻是以符合社會規範的適應為主（黃騰，2022）。換言之，如果我們仍然從主流社會文化的角度來思考適應，很可能就會一直受限在同化的框下。但從「能動性」的角度來看，社會適應其實也只是為了減低本體焦慮感的一種自我控制，遠遠稱不上是能動性的展現（黃騰，2022）。例如，從行為適應的層面來看，只是可以幫助主體在公眾場所中看起來不那麼奇怪，以符合社會文化的期待和慣例。但是卻和能動者個人所期待的目標和意義截然不同。從主觀幸福感對主體意義重視的角度來看，如果我們不知道能動者的目的和意義是什麼，我們根本無從理解其行為的意義，更不可能發展出以主觀幸福感為主的新二代政策。正如廖婉余（2020）所說，一直以來，我們對於新住民生活改變能力的著墨較少，沒有進一步去瞭解新住民「如何」變成他們想成為的人以及做想做的事的歷程。

林純燕與賴志峰（2014）在探討適應和幸福感的論文中指出，學校主要的適應面向包括常規適應、師生關係、同儕關係及學習適應，而在這四者當中，「常規適應」的平均數高達 3.52，而「師生關係」最低，只有 2.99。林純燕與賴志峰對常規適應的定義是：「學校的教學環境中，為了維持一定的團體規範，利於教學活動順利進行，會訂定一些行為規章，學生表現出來的行為符合常規，稱為常規行為」。換言之，這個調查另外一個角度可能會是告訴我們，新二代年幼時比較好的適應面向，主要是在常規適應，而不是人際關係方面的適應。林純燕與賴志峰也發現，適應的程度也並非不變，而是隨著年紀而動態改變，例如從小學四年級到六年級，學生的適應程度會開始下降。但漸漸成年的他們，究竟後來發生了什麼，目前尚沒有研究能夠告訴我們。Schwartz 等人（2010）認為，移民的不同生活階段與歷程其實都是充滿差異性的，但傳統的文化同化或適應模型總是過於線性或靜態，無法充分解釋當代移民的文化調適歷程。所以他們主張我們應採取更具動態性與情境化的觀點，將文化適應視為一個涵蓋行為、價值與身分等不同層次的過程，並強調其在不同社會脈絡下的差異，以反映當代移民經驗的複雜性。

因此，從 Sen（1999）的主觀幸福感和能動性的角度來看，移民的自由程度仍然必須回到他所在的生活經驗。但是，生活所在的社會脈絡複雜性較高，所以必須透過更多質性的方式來探討這些複雜脈絡與個人意義之間的關係，才有可能在這些脈絡的基礎上幫助更多的新二代和政策重新理解和詮釋。

整體而言，如果我們要探討如何提升臺灣新二代的主觀幸福感，我們不能停留在分配式的社會政策，也不能把人化約成獨立存在的自由個體，更不能將適應主流社會視為是提升移民幸福的基礎。因此，本研究回溯主觀幸福感背後的能動性基礎，把新二代放在社會結構與關係來思考，從他們知覺的生活經驗，探究社會位置對他們的影響，並從中思考如何超越適應主流社會的框架，以及提升其主觀幸福感的可能性。因此，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透過探討臺灣新二代的生活經驗，以促進其主觀幸福感。

本研究問題為：

- 一、從能動性及賦權的角度，探究社會位置對新二代的影響？
- 二、從主觀幸福感的角度，探究如何從新二代的經驗與觀點來反思新二代的適應問題？

參、研究設計

一、研究場域及參與者

本研究聚焦在工作前的學習階段，因此選定大學生作為研究參與者，才能包含小學、中等及大學的階段。研究參與者主要是就讀北部大學的 12 位（3 男 9 女）學生。其中，母親的國籍中有 10 位來自越南，2 位來自印尼。在參與者的代表性上，具有某種程度的限制。主要是這些來自北部大學的學生不一定能代表所有臺灣新住民子女的想法。除此之外，就如同後面會提到的，這些新二代具有一定的身分隱藏，因為他們意識到主流社會對於這樣的身分可能具有一定的負面標籤，所以也不一定會想要參與訪談。因此，在尋找參與者上，部分參與者是透過新二代彼此之間的介紹。介紹過程中，也有參與者提到有些新二代因為無法面對自己的成長經驗，所以拒絕接受訪談。這也代表可能有存在較多負面經驗的新二代並未參加這次研究。這些都是本研究參與者的代表性限制。

二、研究方法

如文獻探討所說，為了深入瞭解新二代的生活經驗，本研究採用質性方法中的

敘說研究法進行。透過讓新二代講述生活經驗故事，理解他們如何建構現實生活的意義，並協助我們詮釋其經驗（Clandinin & Connelly, 2000）。Clandinin 與 Connelly（2000）也提到，敘說研究可以利用多種不同的文本來源，例如深度訪談、札記或其他個人表達形式，也特別適合探索長期經驗或身分建構方面的議題。因此，此研究方法非常適合此次新二代的研究。在敘說研究中，主要的訪談主題包括個人家庭生活、學校生活，以及對新二代身分特別有感覺的事件與經驗。參與者根據這些問題自由回想相關的生活經驗，特別是以說故事的方式進行講述。每位參與者皆採個別訪談，並允許參與者能夠盡情自在地分享其生活故事。在過程中，研究者主要會採用深度訪談的技巧，也就是會針對相對的疑問進行追問和釐清，瞭解故事的脈絡和意義。因為深度訪談特別適合用來處理複雜和敏感的經驗與議題，透過來回對話與提問，更能掌握複雜的經驗與意義（Riessman, 2008）。由於本研究主要是探討新二代的生命經驗，所以訪談大綱有非常大的開放性：首先是請參與者分享原生家庭的經驗，特別是從父母親認識的故事開始，然後才從故事中慢慢理解參與者和家庭成員的關係及其想法。其次，則請參與者分享成長經驗中與新二代身分特別有關的經驗。一樣是由參與者先分享故事，再由主持人根據故事前後的脈絡進行釐清，以瞭解參與者作為新二代的處境、感受和想法。並且鼓勵他們可以同時連結自身的「情緒感受」，協助新二代表達他們經驗到的內涵。本研究皆由研究者親自訪談，並進行手札記錄，訪談時間每位 2 至 5 小時不等，依照個別參與者的分享狀況和對話而定。

訪談資料的分析，首先是進行訪談稿的逐字轉譯，並根據參與者的順序進行資料編碼，分別是從 A 到 L，一共 12 位。參與者後續的編碼則根據逐字稿的頁碼而定，因此，如果是 A-12，代表是第一位參與者受訪內容的第 12 頁。在內容分析的部分，為了確定資料的信實度，本研究特別重視參與者訪談資料的三角驗證，也就是在不同的參與者中，是否有共同的發展脈絡。藉由這些共同性，驗證這些經驗是否是獨特的個人想法，還是具有社會背景的共通性？此外，就如 Drydyk（2013）提醒，能動與賦權的概念應從主體的「社會關係」中來理解。所以，我們應從能動者「情境下」的「關係」來理解其生活經驗。就如同 Bourdieu 與 Passeron（1977）在分析鉅觀階級再製時，聚焦的是分析家庭和學校「場域」中的社會實踐歷程，而非純粹將抽象、鉅觀的社會結構再製或微觀的個人經驗。因此，用社會學的概念，我們可以將「家庭」和「學校」視為是介於鉅觀和微觀中的中介場域，就是我們應從

「鉅觀一場域—微觀」的相互影響來理解人與社會的關係。所以，本研究分析將情境著重在中介的場域上，主要是聚焦在該年紀新二代的家庭和學校生活情境，因為這也是他們大部分生活主要會經歷到的社會場域。也就是說，在鉅觀的社會制度與文化上，對於新住民與新二代可能有一定的背景和觀點，這些就會構成新二代所處的「社會位置」。就如劉苑杉（2022）提醒的，早在新二代出生之前，社會就已經把他們冠上帶有歧視意味的「外配子女」的稱號。但是，我們如何理解此社會位置對個人微觀的影響與意義，應該要從介於鉅觀結構和微觀經驗中的家庭或學校場域著手，透過其間的人與人的關係來理解其獨特的處境。例如，在「學校」的情境中，同學是否因為社會普遍對新住民的身分認知產生特別的互動經驗，而新二代（主體）又是如何解讀和回應這些經驗，都將構成我們理解能動者在特定情境中所反映出來的社會位置、關係和意義，進而有助於我們理解其主觀幸福感。除此之外，为了提高信實度，本研究也會適當引用參與者的訪談內容，提供相對應的經驗資料，讓讀者可以透過對比這些訪談內容，確認是否與分析的脈絡和概念一致。

此外，從有效性的角度來看，本研究分析時也會扣合先前文獻探討的概念，例如，在社會位置上，是不是他們所分享的經驗都和新二代的身分有關，如此一來，比較能夠確認這些經驗是不是反映其獨特身分的社會位置，也才能確認概念抽取時沒有脫離新二代所在的社會經驗的脈絡性，掌握參與者的意義和觀點如何被其社會和文化脈絡所塑造並影響這些脈絡（Maxwell, 2013, p. 29）。為了確定脈絡的有效性（validity），本研究也透過比較單一參與者內的故事前後連貫性，以及不同參與者故事之間的一致性，以確認這些概念和主題更能反映個體的經驗和社會的位置。

肆、研究發現

本研究從能動性的角度探討新二代的「社會位置」對新二代的影響。所謂的社會位置，指的是新二代在臺灣社會脈絡中的特殊處境，這些處境對於新二代有一定的共同性，很難把它歸因成個人的境遇。研究發現，社會位置帶來的影響主要有三，如下所述：

一、社會位置對個體經驗的影響一：標籤化與身分隱藏

首先，是最常被提到的「標籤化」問題，也就是主流社會中的他人常把新二代的各種外貌和外在表現歸因於其新二代的身分，然後用在地的文化或沒有理由的方式推論其間的關係，且通常帶著負面的訊息。例如，有參與者說道：

我曾聽到別人說……新二代的話可能就是學習能力不足啊，或者是比較遲緩，我記得是國小，國小、國中都有。那時候可能考得比較好，他們居然很意外說，原來就是混血也可以就是成績很好。（L, 18）

我們就被說你們是外籍新娘的小孩……久而久之，聽起來就很不舒服。同儕就一直很喜歡放大去檢視你的身分，我就覺得超莫名其妙。……我覺得越南的同學最可憐，因為越南同學比較黃，黑黑黃黃，然後是我同學戴金耳環，被罵說是太妹。還有人染頭髮，被說因為越南媽媽愛漂亮染頭髮，小孩子也染金毛。（K, 23）

大家一聽到新住民、新二代，第一個想起來的會是東南亞或是中國，我會覺得這算是一個比較負面的刻板印象。歐美血統你會叫他混血兒，可是東南亞的你會叫他新二代，就是那種感覺。（C, 10）

其實是從阿嬤開始，然後鄰里他們也會有說一些，就是閒話或是成見。然後我覺得我很早就意識到這個點，有可能會被人家攻擊什麼的。……我身邊的那些新二代朋友，他們是從國小到國中，在社交上面，是呈現自閉的狀態，就是很不敢跟別人家講話。（I, 16）

由於這種經常出現的偏見或負面標籤充斥在生活中，就像J所說：「被媒體渲染的很嚴重，他們總是把外籍新娘說成是嫁過來為了騙錢、很容易對婚姻不忠，然後也可能逃跑。這種成見總是帶著歧視，造成對外籍新娘的直接傷害」（J, 5）。因此，對於新二代來說，最好的方式就是「隱藏」其新二代的身分。就如先前所說，新二代相對於第一代新住民來說，從小生活在臺灣，加上有來自父親一半的基因，如果沒有特別揭露，基本上，身邊的人很難辨識出來。但是，這種「隱藏」的策略，常常不是一開始就存在，有些參與者就生活的社區和學校中，身邊有很多的新

二代同學，根本不需要隱藏。又或者小時候還不懂事，也不一定意識到身分帶來的困擾。

一開始，國小之前這對這個身分沒有意識，然後在國小的階段，其實大家背景都差不多，所以覺得這不重要。然後到國中，因為這個身分，就在人際關係就比較有壓力，不太敢去提及，除非有好同學來家裡玩。（E, 45）

小學一、二年級時並不在意自己新二代的身分，但從小三開始，因為講話口音被同學嘲笑，同學還特別強調她是「外籍新娘的小孩」，因此從國小三年級後就逐漸避免主動提起自己是印尼媽媽所生。（K, 23）

我覺得是國中那段時間，讓我對這個身分不敢說，也不敢表達。（L, 15）

我覺得可能是在學校裡的壓力，還在我的心裡，就算我換了一個環境，我還是會想到外界，我會被怎樣對待，就算在家裡還是會覺得不安。（L, 16）

我是一個還蠻容易受到別人的那個外在的看法影響，所以我就會知道說，我不想要因為別人知道我是新住民二代這個新二代的這個身分，然後對我有什麼特別的第一印象或是以偏概全的想法之類的。我擔憂別人因為知道我是新住民身分，就覺得你應該要怎麼做或是你應該有哪些行為的那些，我就覺得我不想被別人用特別的眼光去看待，我只想要覺得我就是一般人，我就是跟大家都是一樣的。（I, 32）

由此可知，新二代的身分在當前臺灣社會的脈絡中，還是傾向被負面解讀，這些負面標籤普遍存在社會中。對新二代而言，常常是從其他同學互動中感受到這種負面標籤。在他們原本就不容易被辨識的外表和行為下，「隱藏身分」變成是他們隨手可用的行動策略。

二、社會位置對個體經驗的影響二：與母親關係的扭曲

在家庭的情境裡，本研究也發現，社會的負面標籤雖然一開始是針對第一代的新住民，但是回到家庭的系統，卻會發現新二代處在家人的關係中，也受到媽媽身分的影響。以 D 為例，因社會氛圍中對新住民的負面觀點，導致家中長輩和新二代母親之間不好的關係，進而影響到母親與新二代的關係。

老人家還是普遍對新住民有一點歧視，就比如說落跑新娘之類的。所以其實奶奶對於媽媽有一點不太信任，常會覺得說，她會不會把薪水帶回家什麼的？然後可能跟奶奶的關係處得也比較不好。在我大班的時候，他們就搬出去，就六日回來，所以我和爸爸媽媽相處的時間沒有很多。（D, 4）

媽媽假日回來看我們，都會帶自己做的菜回來，像是越南春捲河粉。但不是奶奶喜歡的口味，所以奶奶都會叫他拿回去，還直接跟我們說不要吃。所以媽媽會因為被拒絕太多次，就比較不會再帶來了。（D, 5）

從這裡可以看到，原本應該是每天照顧子女的媽媽，因為奶奶的關係，已經分開住在不同地方。而且連奶奶都對媽媽的新住民身分充滿歧視，這些經驗不僅讓她和媽媽的關係變得疏離，也讓她對自己的二代身分產生排斥。

之前跟媽媽沒有常相處，覺得自己對媽媽還是有點陌生。加上奶奶也會講媽媽的事，所以在腦袋就是有既定印象，會跟媽媽保持距離。（D, 18）

當媽媽來參加國小畢業典禮的時候，我那時候覺得不好意思，覺得媽媽來會有點丟臉。那時候他就給我畢業花束，但我不想拿。（D, 6）

正常來說，子女是不會和媽媽有這麼強烈的陌生感，或刻意保持距離的。但是，在家庭關係中，因為負面標籤導致其他家人和新住民母親之間的歧視和互動方式，造成了「社會負面觀感—與母親關係扭曲」的現象。再以 E 為例：

我阿嬤對我媽比較有偏見，那時候我們還在大家庭，煮飯如果是我媽煮的，我外婆就不吃，除非是伯母煮的，我阿嬤才會吃。（E, 3）

可能因為媽媽來的時候，大家對越南的新住民就還有刻板印象。所以媽媽也就不會希望自己的小孩也被歧視，因此就不太會說太多自己的文化或語言。（E, 2）

有時候，和母親關係的扭曲不一定是母親受到明顯的歧視，而是新住民母親在整個婚姻交易過程中產生負面的情結而且移情到新二代身上，並扭曲了親子關係。K 提到來自印尼的媽媽：

我媽是長女，外婆家裡對大女兒是很苛刻的，覺得大女兒就是拿來犧牲的。其實這場婚姻就是一個經濟交易。(K, 2)

我媽媽不愛我，他看到我就想到外婆怎麼對她，她覺得很不公平，也很自卑。所以我媽看到我其實是嫉妒的，她會把氣出在我身上，從小就很常打我。……媽媽的教導方式有問題，她對小孩子都是用打的方式，她會拿衣架、皮管、充電線那種東西打我。我姑姑會阻止他，姑姑對我來說，是一個彌補我缺乏母愛的一面，所以我就叫他姑媽咪。後面加個媽咪，就是她很像我媽媽，他給予我的是母愛，我母親給予我的是肉體，他生下我，我很感謝他，但是他沒有給我教育，沒有給我愛。(K, 8)

所以，在這種因為經濟交易而移民的脈絡下，也會扭曲母親和新二代之間的關係。這種扭曲不一定是來自臺灣大家庭對媽媽的歧視，也可能會對新住民產生不良的影響，甚至移情到自己的小孩，最終扭曲了與新二代之間的親子關係。

三、社會位置對個體經驗的影響三：善用轉變中的社會氛圍與資源

臺灣在 2015 年左右開始推動新南向政策，夏曉鵬(2018)指出，新住民族群轉眼從「社會問題」提升為「社會資產」。但「轉眼」這個說法過於簡化，畢竟社會成員長期累積的負面觀感也不可能突然消失，實際的情況比較像是帶來一種可能性，並且讓新二代有機會產生新的行動作為。例如，對某些新二代來說，若能夠善用轉變中的氛圍與資源，就可能開創一些新的可能。J 作為一位新二代，也很早就知道社會的負面觀感對新二代非常不好。

越南會有一些傳統習俗，像是戴耳環，但是，如果有女生的新二代戴耳環，就會被罵是婊子，被老師歧視，因為傳統臺灣社會觀念就是要乾乾淨淨的，什麼都不要帶。(J, 10)

我身邊認識很多新二代，都是很優秀。但是他們對自己的童年都是很難啟齒的，他們有一種對原生家庭的怨恨。其中有人說過一句讓我很深刻的話，就是我的出生是一場失敗。很多人對自己從小是新二代這個身分全面否定，真的是完全不喜歡。有很多越南媽媽也都已經放棄自己的小孩，自己回到越南去，所以很多都是單親家庭。(J, 14)

不過，後來因為新南向政策，J發現：

以前大家都把我們當垃圾，現在卻覺得我們是前進新南向的第一線新兵，因為會三種語言，未來就靠你們了。我們很多朋友都遇到這種情況，可能前 10 年被說的一文不值，怎麼近幾年突然就不一樣了」。(J, 19)

新二代這個詞我只有在利益導向的時候我才會講。比如說我們出去提案就要找一個比較讓人會注意到的詞，所以我們就會說是新二代。其實很多做新二代議題的人，都會刻意把新二代說得很可憐，雖然他們真的很可憐，但這樣才會獲得更多的資金和資源投入。所以我覺得新二代有點算是利益和標題的一個東西，不管是申請資源或政府計畫。(J, 29)

在這裡我們看到，新二代因為在新的社會定義中，被重新賦予另一種「社會位置」。這種社會位置不僅塑造看待新二代的另一種可能，也提供了更多社會資源的支持。因此，在這個新的社會位置上，新二代有更多正面的可能，讓那些原本傾向「隱藏」的新二代，甚至轉而自願揭露身分，以爭取更多資源。但值得注意的是，這種揭露目前還只是一種利益功能的導向，並不是日常生活的完全改變，只有在特定的時刻作為一種「社會工具」使用，所以可以說是把身分作為是一種「工具性」的行動策略。也就是說，由於新的社會位置下新二代的身分被賦予更有發展性的期待，因此聚集了相關社會資源。所謂的「工具性」，就是新二代善用，甚至更主動揭露自己的身分，以取得相關的社會資源。然而，在新二代的說明中，目前並沒有著墨太多在自我認同的層面，僅是作為一種工具來取得社會資源，因此，其採取這種身分作為社會行動的意圖，比較像是一種工具上的使用。

四、學校適應與身分認同

接下來，本研究試圖回應研究問題二中的「主觀幸福感」和「適應」的議題。首先回到「適應」的問題。之前提到，我們不應該把「適應」簡化成配合主流社會常規，而應該從主觀幸福感的角度，重新以新二代的經驗詮釋所謂的「適應」。在學校適應的部分，研究發現似乎隨著學習階段上升，「能力表現」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臺灣，升學競爭壓力大，成績幾乎成為評價學生表現的重要基礎。特別是學業成績，成績好的時候，新二代的身分就不會產生太大的負面影響。就如 A

所說：

我真的覺得在學習上好像對我沒什麼影響，我在猜是不是我的成績算是還可以，所以我的新二代身分才不會帶來什麼障礙。但如果我的成績不太好，他們會不會因為我的身分而跟我在學習上的互動有不一樣。（A, 33）

就像 G 所說：「學習與工作跟自身能力有關，跟新二代的身分無關」（G-DB, 1）。對 I 來說，情況也是類似，她也是很早就知道在學校中，成績是相對重要的同儕衡量標準。並且因為她知道新二代的身分容易帶來負面標籤，所以只要把成績顧好、身分隱藏好，就不會造成對學習方面的困擾。

自己現在回想起來，自己有隱隱約約想用成績證明自己，不讓別人覺得新住民的子女一定都是怎麼樣，不想讓他們覺得我笨，也不想讓他們覺得我爸媽教得不好（I, 26）。越來越大之後，我不會特別去講我的新二代身分……我覺得我長大之後應該用能力去證明自己，而不是什麼身分。所以我就更不會去講我是新住民之女。（I, 28）

這種情況到了高中更是明顯，都是需要透過升學考試才能依成績進入的，這也代表著進入同一學校彼此的能力相差不多，因此，很難透過負面標籤來連結新二代的身分。另外，高中階段在心智上也比較成熟，也會讓負面標籤的問題減少。

小學同學他們會覺得你的身分是很特別，就是「蛤，你媽媽是越南人喔」這樣子。我不知道是嫌棄還是訝異，但是就不會太想講。高中時，可能是大家都長大了，覺得也沒什麼。……就知道你媽媽是越南人，然後直接進入下一個話題，好像也沒有在你的身分上做一些探討，覺得好像也沒什麼不一樣。……（高中）會比較敢講，就是其實每次講這種話的時候，其實內心每次都是很忐忑的，因為我不知道同學會不會因為我的這個身分不想要跟我當朋友嗎？但是發現他們都只有對我的身分講說「喔，你媽媽是……」，然後就帶過，所以就變比較安心。（D, 16-17）

好像越大之後，通常談到這個身分就比較不會有那種像小時候的那些比較歧視的語言。大家成熟了，不會再亂說話。（H, 23）

國中的時候，同學就是會有負面標籤嘛，刻板印象。…然後高中同學的話，那時候就大家心智可能比較成熟一點，所以就是我覺得有點回到國小的感覺，就是會好奇，不會像國中那麼有攻擊性的感覺。（L, 25）

整體來說，學校的學習適應過程中，似乎還是有一些獨特的發展脈絡。因為在學習適應過程中，慢慢到了國小、國中以後的階段，通常還是很容易感覺到負面標籤的存在，這時候就會開始出現隱藏身分的策略，部分的人會開始把焦點放在學習上。不過，在國中階段，剛好是自我認同發展的重要階段，雖然在學業上不一定有問題，但是，自國小、國中慢慢開始出現的隱藏身分策略就會減少這些新二代與他人以新二代身分交流對話的經驗。

因此，從學校適應的角度來看，新二代的學校適應不能簡化成行為適應。很多時候，他們必須適應人際關係中的負面標籤，面對這種情境，開始普遍出現身分隱藏策略，或有部分人將注意力轉向學習表現。但與此同時，新二代也減少與同儕之間交流和互動的機會。這個適應過程，同時牽涉人際關係、學習表現和身分認同的複雜影響。

五、物質生活雖然滿意，但仍不完整

「生活滿意度」是衡量主觀幸福感的重要面向之一，若能從新二代生活經驗瞭解其對生活滿意度的觀點與詮釋，將有助於我們分析新二代的主觀幸福感。延續上一段的發現，這些新二代只要隱藏好自己的身分，在學校透過各種方式表現出自己的能力，似乎就不太會有什麼問題。但那看似可以被隱藏而忽略的「新二代身分認同」其實對新二代頗具意義。以 D 而言：「基本上，我對我的整體生活都是很滿意的」（D, 32）。但她又接著說：

但是其實我有一些內心的矛盾。我覺得我的矛盾一直是到高中時開始有一點認同自己的身分，才慢慢生活更滿意，矛盾減少。就是開始去承認這個身分，然後如果其他人對它有誤解的話，會想要對他做辯護，或是讓他去理解，就是去解釋。（D, 32）

像是前面提到，D 因為奶奶對媽媽的歧視，所以媽媽搬到外面去住。但是到了高三的時候，D 覺得「越長大越覺得對媽媽有些抱歉……。因為之前沒有很相

處，加上奶奶也會講媽媽的事情，在腦袋產生一些既定印象，所以就會跟媽媽保持一點距離」（D, 18）。但是：

長大後，比較能面對這個身分，也會為這個身分做更多解釋和辯護。就是跟奶奶說，她的觀念是錯誤的。所以現在媽媽拿越南菜回來的話，也不用跟奶奶講什麼，就是把那些菜故意吃完，給奶奶看見說我們就是吃光光，表示其實我們還蠻喜歡的。（D, 22）

而當 D 開始能夠接納自己新二代的身分，例如，能夠勇敢、不避諱地去為自己的身分表達立場，這時候，他的生活滿意度才具有完整性。

現在我希望我們可以勇敢的，不用避諱地去講我們是新二代……對於我講出這個身分，我不用再感到畏懼，然後被大家平等地對待的那一種。（D, 21）

就是即便你有好的生活環境，但你還是會很不安別人去戳破你這個身分，到現在就是你不用去有所擔心，就是真的是屬於內在跟外在的整體生活滿意度都很高。（D, 33）

換言之，一般偏向生活環境物質層面的生活滿意度對 D 來說，似乎並沒有涵蓋到她對新二代身分的認同。她雖然認為就物質生活環境來看，她的生活滿意度是高的，但同時也是「矛盾」。而這種矛盾，唯有在後來她高中開始能夠接納與捍衛自己新二代有關的身分時才會減少。由此看來，就一般主觀幸福感或生活滿意度的調查來看，就很難反映出新二代身分認同對他們的重要性。

類似的情況也出現在 A 身上，高中後，她也選擇隱藏自己的新二代身分，而且因為成績不錯，所以一直以來似乎也沒遇到什麼困難。有關自己的生活滿意度，A 也說：「在生活滿意度上，應該算是蠻高的」（A, 40）。但隨著年紀愈來愈大，A 又說：

長大後，當我比較瞭解這個社會對新住民的負面看法，我的內心就開始處於一種矛盾的狀態。自己的內心卻有很多顧慮，覺得自己還是沒辦法開心的、毫無疑慮地跟別人講自己身分的話，我覺得有點不太幸福。……如果排除掉我新二代的身分，整體生活是滿意的。但是從新二代的身分來看，內心卻有很大的疑慮。（A, 41）

在她整個有關生活滿意度的訪談中，一共出現了四次「矛盾」這個詞（A, 23, 29, 40, 43）。這種矛盾的情緒，或許很難用言語形容清楚，但是基本上可以表達她對新二代身分認同的在意程度，而且也反映出一般生活滿意度的概念並未包含她身分認同這個面向。

伍、反思與討論：幸福的窺見

一、新二代幸福的多層次動態關係：作為特定社會位置中的個體

綜合來看，新二代的經驗凸顯了他們所在的社會位置對個人生活和幸福感帶來的重要影響。也就是在第一代新住民透過婚姻移民臺灣的社會背景下，不管是媒體的報導還是街頭小巷的口耳相傳，產生許多負面的社會標籤。新二代在這些社會文化的脈絡下，很容易成為負面標籤的對象，並且造成家庭關係的扭曲。從這個角度來看新二代的生活經驗，要理解他們的經驗和意義，就需要從不同的層次來詮釋，例如「鉅觀/Macro—場域/Field—微觀/Micro」，從中理解其間複雜的關係。研究發現中，因為鉅觀的社會位置所產生的社會歧視，透過家庭和學校場域中的人際互動，而在個人微觀層次上塑造出多數新二代隱藏身分的行動，同時也部分影響了他們對學習的看法。

文獻探討中提及，有關移民的研究正慢慢地從「客觀標準取向」轉變成「能力取向」的「主觀幸福感」。但能力取向強調的個體自由卻忽略其所在的社會脈絡，包括社會位置和社會關係。本研究發現，新二代面對的是對新住民及其子女充滿歧視的負面標籤，在他們還未成年時，這些歧視就已經影響了家庭成員的關係和同學之間的互動。如果我們還是期待新二代能夠「獨立自主」地去面對這些社會條件，只會讓能動性的概念淪為抽象的學術名詞。關於新二代「隱藏自己身分」的現象，並不是他們獨立自由選擇的結果，而是為了因應來自社會的負面標籤。關於新二代「特別表露自己的身分」的現象，也是因為社會氛圍的轉變，開始把新二代視為南向發展的重要資產。當然，新二代還是可以選擇什麼時候可以部分地揭露自己的身分，或者以什麼方式在南向發展中傳遞特定的聲音或表現，但是，這只是特定選擇範圍下所做出的「自由選擇」。就如 Drydyk（2013）所言，隨著能動性概念使用的

愈來愈普遍和多元，有時候，我們太容易使用過於「弱化的」（weak）能動性來理解個體自由，也就是用一種極度簡化、去社會脈絡化的方式來理解能動性。

再者，我們也不應該只從主流社會文化的角度來思考新二代或移民的政策，因為那只是一種同化的思維。如果回到主觀幸福感定義的「生活滿意度、情感、意義」三面向來看，這些新二代就算覺得某種程度上自己的生活滿意度已經頗高，但是仍然因為自己的新二代身分而衍生一些困擾，並導致某種程度的「矛盾」。就一個「朝向目標採取行動」的能動者來看，這些獨特的經驗會再塑造他們採取下一步的行動來解決這些問題。而如此動態的過程，只有在多層次的理解之下，才能掌握。因此，對於未來新二代或移民的研究，應該要採取這種「鉅觀一場域—微觀」多層次的動態角度來思考，才能跳脫客觀取向、能力取向或主流社會非常的限制，看到改變的可能與新的政策方向。

二、幸福是做更完整的自己

就如同 Cooley（1902）對鏡中自我的描述，自我總是在個體和社會的互動中相互建構而成。就像上一段所言，新二代微觀的生活經驗總是受到鉅觀和場域層次的影響，無法置身其外。而對臺灣的新二代來說，小學以後他們經常因為社會的負面標籤，而採用隱藏的策略來掩蓋其新二代的身分，但這也可能讓他們付出了建構自我認同的代價。隱藏身分的代價可能有三個彼此相關的方面：負面自我評價、自我認同建構的困難、過度依賴他人評價。除此之外，第四個問題則不是來自於學校中的同儕，而是來自於扭曲的家庭關係，進而對新二代的自我產生負面的影響。如下所述：

（一）Cooley（1902）所謂的鏡中自我，指的是我們「想像」中的他人如何看待我們，並且這種看待的方式會形成我們對自己的評價與相關情緒。在訪談過程中，隨著年齡增長，新二代逐漸意識到社會可能會如何看待他們，所以，就算原本自己對於這個身分沒有負面看法，但漸漸長大後，多半還是會「想像」社會中的他人會如何「負面」看待這個身分。從這個角度來看，對新二代的自我評價和情緒發展可能就有負面的影響。這部分或許有待後續研究進一步再次確認。

（二）由於新二代經常隱藏身分，所以，隨著這個身分所帶來的一些相關情緒和意義很難與同儕分享。但是，就青少年階段來看，藉由同儕互動產生的社會性支持，可以帶給青少年更完整一致的自我認同，例如建立自己的價值觀、人生目標和

信念 (Vransisca, 2022)。Vransisca (2022) 提到的同儕社會性支持，其中兩個主要的管道就是情感性的支持 (emotional support)：藉由同儕情緒上的關懷理解而感到被接納和情緒的穩定，以及尊重性支持 (appraisal support)：藉由同儕的肯定與尊重，感受到自己被認同，增加自尊和自我效能。雖然這是一般青少年多少都會面臨的問題，但對於新二代來說，在這種身分隱藏的過程中，由於缺乏同儕的互動回饋，新二代的自我認同發展相對困難。

(三) 新二代在適應過程中，除了身分隱藏之外，還會透過努力表現來取得他人的認同。對他們來說，這看起來像是一種補償的關係，很自然地透過成績或其他表現來取得他人的認同，就像 I 提到，想要透過成績表現來否定他人對她產生的可能負面標籤。然而，過度依賴他人的評價，可能會讓個體發展出條件式的自尊 (contingent self-esteem)，也就是只有在達到某些外在標準（如學校或社會定義的成功）時，才感到有自我價值，導致一種過度依附他人的自我價值 (Crocker & Park, 2004；Crocker & Wolfe, 2001)。如果用主觀幸福感的角度來看，由於過度依賴他人認同也會降低個人自主性，進而導致主觀幸福感的下降 (Ryan & Deci, 2000)。

(四) 第四個可能導致的問題則是透過扭曲的家庭關係所間接導致。例如，K 的母親把自己被交易過來的情感移情到 K 身上，導致過多的打罵關係。而當 K 的母親離婚之後，K 也經歷了創傷、很痛、無能的情緒。D 也是在長大之後，才開始意識到自己對母親的那份愧疚，開始懂得對抗奶奶對母親的不公平對待。就算 D 對於自己物質外在的生活滿意度是高度肯定，但是仍然存在「矛盾」，也就是她仍然對於自己的新二代身分帶來的影響感到困惑。由於母親在家裡通常扮演最重要的照顧者角色，過去研究也曾發現，在移民家庭面臨新的環境拉扯時，可能會導致家庭系統和功能的變化，進而導致家庭失能，影響到主觀幸福感和心理健康 (Elizarov et al., 2023；Rosenbusch & Cseh, 2012)。但是，和過去研究不太相同的是，這裡的家庭關係並不是因為母親因為移民後的工作生活而導致沒有時間照顧孩子。而是因為家庭重要他人對待母親的方式，導致母親無法在家庭中發揮應該有的功能，例如，被迫搬出，或者有其他家庭成員取代媽媽的角色。然而，回顧過去臺灣的研究，幾乎沒有看到這樣跨世代的影響過程。但是，這在這些參與者的生命經驗中影響深遠。

對於這幾個面向，本研究試著用「成為更完整的人」來涵蓋這些議題，雖然不一定能夠涉及所有面向，但是，這些問題似乎都在呼應 Jung (1953) 所謂的「個體化」(individuation) 需求。對 Jung 來說，每個人的心理發展歷程，需要去整合各種

意識的面向，讓那些過去被否定、傷害、壓抑、不被接受的部分，都在這個歷程中逐漸被面對和整合，最終成為一個獨特而完整的自我（Self）。對於新二代來說，那些因身分隱藏所失去的建構自我認同的機會、那些在扭曲家庭中失去的關係、那些對自己身分認同存在的種種疑惑，雖然可以有意識地予以隱藏，但也常會在某些時刻成為生命中不得不面對的課題。

追求幸福的過程，總是避免不了付出和堅持。但是，新二代卻面臨更多的挑戰，我們很難用客觀、標準化的、主流社會的觀點，來理解對新二代來講何謂幸福的生活。那些社會互動過程中所傳遞出來的負面標籤、那些看似可以被忽略隱藏的身分認同、那些發生在家庭私領域一般人很難理解推薦的糾結關係、那些一直跟隨著自己不斷需要處理的內在議題，都不是我們能從一般社會生活經驗來判斷的。加上新二代那難以被辨識的外表和語言，更讓新二代位於一種隱晦和私密的處境，進而更容易被大眾忽略。作為新住民第一代的母親，或者其中涉及的原生家庭成員，可能也很難理解為什麼新二代會傳達出如此沉重的內在感受，畢竟，這些家庭成員都有自己所背負的社會關係，或者認為自己正在對新二代做出最好的選擇。當我們理所當然地從「資源分配」或「同化」的角度來看，我們會以為新二代已經具備大部分臺灣學子所應有的社會資源，並且在社會行為適應已經處理得很好，至少可以藉由身分隱藏很好地融入社會當中，也可以透過自己的努力表現成就來證明自己。而且就像能動者每天所依賴的實踐知識一樣，新二代在生活中行動時都不一定能夠意識到，就像許多人都是到長大之後才慢慢開始有能力去梳理和處理這些內在議題，而那正是我們（包括新二代）常常忽略、看不到，但卻是新二代實際發生的經驗。所以，本研究的標題前面使用：「窺見幸福」，原因正是因為新二代位於一種較為隱晦和私密的處境，透過類似本研究，我們比較能夠「窺見」幸福對他們來說究竟代表什麼，進而有助於新二代和我們重新反思可能的社會行動或政策作為。

陸、結論與建議：從單向適應到雙向適應

從主觀幸福感的角度來看，目前我們所使用的「適應」這個概念，仍然太過於狹隘。顯然，新二代的適應不是只有配合主流社會常規或慣例這麼單純的議題。所以，傳統上適應這個概念過於單向，應該要重新被概念化，視為是一種「雙向的動

態適應過程」。我們應該透過不斷地理解新二代的經驗和處境，來掌握他們所期待的幸福生活，然後回饋作為政策調整的方向。正如之前我們一直提到的，個體反思和社會政策之間應該存在不斷的社會循環歷程，同時也呼應個體的自由不應該獨立於特定的社會脈絡。本研究只是嘗試踩出第一步，試圖挖掘新二代的生活經驗，進一步釐清適應過程中所發生的脈絡和意義。未來的政策應該根據更多的分析研究，重新在適應過程中為新二代賦能，所以它是一個持續的過程，也是一個雙向的過程。以下將根據本研究的發現，提供一些政策發展的方向與建議。

一、建構新二代的反思力與更完整的自我認同

從能動性的角度來看，行動的能力需要有反思力作為支持。在有限的反思底下，目前許多新二代選擇用身分隱藏、努力表現的方式來和社會他人互動，但卻無法覺察社會位置和這些行動方式對自己帶來的影響，甚至可能會歸咎或轉變成為自己的內在問題。所以政策上，我們需要提供新二代反思的能力，主要是讓他們瞭解：特定社會位置下的他們獨有的經驗是什麼，協助他們更能去詮釋情境中的意義，做出更好的選擇。這表示我們需要重新思考對於新二代的教育或增權賦能的方式，不再只是提供語言、文化、照顧的協助，也不是辦理美食或文化節慶的形式活動，而是協助他們如何在特定的社會情境下，理解自己的處境，做出更好的行動選擇。

這種反思不會只是外在情境的覺察，亦應該包括內在自我認同和情緒感受的層面，引導他們在面對特定情境時，如何對外做出適當的反應，以及對內如何建構和看待自己的目標和價值。這表示我們需要一套新的教育方式和內容，而這些方式和內容不是純粹建立在特定的學術理論或文化內容上，而是高度具有社會互動脈絡的課程。因為新二代的能動性展現就是社會實踐的過程，而自我建構的歷程也是社會互動下的結果，所以，這些提升反思力的課程需要基於實際行動者的經驗，有可能來自於對新二代不斷研究分析所得到的結果，也有可能來自於成功行動者的經驗。此外，也因為這些平時隱晦的經驗能在過程中被意識化，將有助於新二代有更好的自我認同建構，而不再是透過否定、壓抑和隱藏，最後卻成為新二代個人需要長期背負的內在議題。

至於那些已經產生較嚴重的自我認同扭曲、壓抑和否定的新二代，政府應該提供諮商輔導的資源，讓他們有機會重新理解內在發生的那些衝突與自我否定，以及

那些透過社會他人和家庭關係，對其自我所造成的可能傷害。但是就如前面文獻所提，目前就連臺灣專業的諮商輔導系統都對於新住民所處的社會文化脈絡不瞭解，所以也不一定能夠針對他們的問題和需求給予有意義的引導和回饋。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也應該致力提升關於諮商輔導對新住民社會文化脈絡的理解能力，並且分享相關成功的諮商輔導經驗。

二、重新塑造社會對新住民的想像

如果從社會位置來看新二代的處境，來自社會產生的負面標籤恐怕是最為關鍵的，因為他不只直接讓人們容易對新二代產生不當的聯想，也會透過對媽媽在家庭關係中的扭曲，而影響到新二代。可惜的是，如果我們問新二代有關學校中小學教育是否有教導學生用更為公平或正面的角度來看待他們，答案幾乎都是否定的。如今，隨著社會愈來愈多元化，加上東南亞的環境愈來愈進步和發展，政府應該更「精準」地重新塑造對於新住民的「正面」印象。畢竟，在大部分的情況下，一般人並不是真正認識新住民家庭所承受的社會標籤以及他所帶來的負面效應，人們總是依賴媒體或口耳相傳。所以，傳達關於新住民更多正面的印象，一方面可以減少社會負面的標籤，同時也可以讓新二代更能夠有勇氣揭露身分，自在地與他人互動。

所謂的「精準」，不是傳達不真實的內容，主要是因為媒體通常偏向報導較為負面的訊息。因此，精準的正面印象是一種需要經過刻意挑選的內涵，特別是針對社會常見的負面標籤。例如，我們可以針對社會認為新住民經濟不好或容易逃跑、新二代學習能力或社會成就不佳、用臺灣文化角度曲解特定文化習俗（戴耳環）等負面標籤傳達更正面的印象，像是拍攝有關於新住民及新二代成功營造家庭社區環境或創造新的經濟產業的故事、以越南或印尼在地的觀點來詮釋其文化的意涵、或新二代在學習與就業的亮眼表現……等。而這些內容可以透過媒體傳達，也可以作為學校的課程教材，一定程度融入現有的領域課程綱與教科書。畢竟，許多領域內容的概念在學習過程中都需要有特定情境的融入，若能結合這些內容做學習的情境背景，既不會影響領域概念的學習，同時又可以對新住民產生新的正面理解。

為了擴大這些新的政策作為的影響力，透過國民教育系統來傳遞新的社會印象是重要的。除此之外，也可以針對一些有許多新住民生活的社區推動相關的政策與教育。然而，不管是透過什麼形式，未來均需有足夠的研究和政策的持續作為，一

方面繼續探討社會變動中新住民的位置和經驗，一方面持續回饋作為政策的依據。就如 Agee 與 Crocker (2013) 所說，為的是要持續不斷縮減政策方向和實際需求之間的距離。

誌 謝

本研究感謝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uncil, NSTC) 之補助與支持 (計畫編號: NSTC 112-2420-H-030-002)。作者亦誠摯感謝匿名審稿委員之寶貴意見與建議，這些回饋大幅提升了本研究的品質與深度。

參考文獻

- 內政部 (2024a)。《新住民基本法》——全面提升對新住民的照顧及權益保障。
<https://www.ey.gov.tw/Page/5A8A0CB5B41DA11E/c9c332c6-21a3-4193-bfa6-2b4fd3619ca9>
-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2024a). *The New Immigrants Basic Act: Comprehensive enhancement of care and protection of rights for new immigrants*. <https://www.ey.gov.tw/Page/5A8A0CB5B41DA11E/c9c332c6-21a3-4193-bfa6-2b4fd3619ca9>]
- 內政部 (2024b)。外籍配偶在台生活相關資訊簡冊。<https://www.immigration-ebook.com/ebook/zh/37/index.html#zoom=true>
-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2024b). *Information booklet on the lives of foreign spouses in Taiwan*. <https://www.immigration-ebook.com/ebook/zh/37/index.html#zoom=true>]
- 王甫昌 (2003)。當代台灣社會的族群想像。群學。
- [Wang, F.-C. (2003). *Ethnic imagination in contemporary Taiwanese society*. Chun-hsueh.]
- 王翊涵 (2020)。諮商心理師多元文化諮商的實踐探究：以新住民女性諮商為例。中華輔導與諮商學報，58，127-159。<https://doi.org/10.3966/172851862020050058004>

- [Wang, Y.-H. (2020). A study on multicultural counseling practices of counseling psychologists: A case study of counseling for immigrant women. *Chinese Journal of Guidance and Counseling*, 58, 127-159. <https://doi.org/10.3966/172851862020050058004>]
- 李佳璇（2015）。新住民子女的教養與學習適應問題之探討。*家庭教育雙月刊*，55，6-16。
- [Li, C.-H. (2015). A study on parenting and learning adaptation issues of children of new immigrants. *Family Education Bimonthly*, 55, 6-16.]
- 林純燕、賴志峰（2014）。國民小學新住民子女學校適應與幸福感相關之研究。*學校行政*，92，205-230。<https://doi.org/10.3966/160683002014070092011>
- [Lin, C.-Y., & Lai, C.-F. (2014). A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hool adjustment and well-being among new immigrant children in elementary schools. *School Administrators*, 92, 205-230. <https://doi.org/10.3966/160683002014070092011>]
- 夏曉鵬（2018）。解構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下的「台灣第五大族群——新住民」論述。<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7733>
- [Hsia, H.-C. (2018). *Deconstructing the discourse of “Taiwan’s fifth largest ethnic group—The new immigrants” under neoliberal globalization*.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7733>]
- 徐敏雄（2011）。社區大學新移民議題融入媒體技巧課程經驗之個案研究。*教育實踐與研究*，24（2），1-32。
- [Hsu, M.-H. (2011). On the experiences of infusing issues of new immigrants into a community college curriculum: A case study of a civic journalists workshop. *Educational Practice and Research*, 24(2), 1-32.]
- 教育部（2024）。各級學校新住民子女就學概況。
https://www.edu.tw/News_Content.aspx?n=829446EED325AD02&sms=26FB481681F7B203&s=4C810A112728CC60
- [Ministry of Education. (2024). *Enrollment overview of new immigrant children in schools at all levels*. https://www.edu.tw/News_Content.aspx?n=829446EED325AD02&sms=26FB481681F7B203&s=4C810A112728CC60]
- 黃騰（2022）。什麼才是她要的幸福？從能動性角度探討新住民子女教育的可能性。*教育實踐與研究*，35（1），75-112。

- [Huang, T. (2022). What kind of wellbeing does he/she want? Educational possibilities for children of new immigra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gency. *Educational Practice and Research*, 35(1), 75-112.]
- 廖婉余 (2020)。Iris Marion Young 之差異政治在新住民子女教育政策上的啟示。嶺東學報，46，225-252。
- [Liao, W.-Y. (2020). The implications of Iris Marion Young's politics of difference for educational policy of new immigrant children. *Ling Tung Journal*, 46, 225-252.]
- 監察院 (2018)。「新住民融入臺灣社會所衍生之相關權益探討」通案性案件調查研究報告。https://www.cy.gov.tw/News.aspx?n=773&sms=9147
- [Control Yuan. (2018). *General investigation report on issues related to the rights of new immigrants integrating into Taiwanese society*. https://www.cy.gov.tw/News.aspx?n=773&sms=9147]
- 劉苑杉 (2022)。誰是新二代？新住民子女在台灣的處境與成長。獨立評論。https://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31/article/12208
- [Liu, Y.-S. (2022). *Who are 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new immigrants"? The situation and growth of new immigrant children in Taiwan*. The Independent Opinion. https://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31/article/12208]
- 戴台馨 (2012)。公平對待新住民——以沈恩的「能力分析法」來詮釋。輔仁社會研究，2，55-79。https://doi.org/10.29700/FJSS.201201.0003
- [Dai, T.-X. (2012). To be fair to new residents- interpreted by Sen's "capability analysis". *Fu Jen Social Studies*, 2, 55-79. https://doi.org/10.29700/FJSS.201201.0003]
- 謝智玲 (2012)。新住民子女社會支持、自尊與行為適應之研究。測驗統計年刊，20，53-75。https://doi.org/10.6773/JRMS.201206.0053
- [Hsieh, C.-L. (2012). A study on social support, self-esteem, and behavioral adjustment among new immigrant children. *Journal of Research in Measurement and Statistics*, 20, 53-75. https://doi.org/10.6773/JRMS.201206.0053]
- 鐘允國 (2017)。我國推動族群發展政策之法制盤點與調適。國家發展委員會。https://www.ndc.gov.tw/nc_708_27047
- [Chung, Y.-K. (2017). *Legal review and adjustment of Taiwan's ethnic development policies*. National Development Council. https://www.ndc.gov.tw/nc_708_27047]

- Agee, M. D., & Crocker, T. D. (2013). Operationalizing the capability approach to assessing well-being. *The Journal of Socio-Economics*, 46, 80-86. <https://doi.org/10.1016/j.socec.2013.07.003>
- Anand, P., & Sen, A. (2000). Human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sustainability. *World Development*, 28(12), 2029-2049
- Anand, P., Krishnakumar, J., & Tran, N. B. (2011). Measuring welfare: Latent variable models for happiness and capabilities in the presence of unobservable heterogeneity.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95(3-4), 205-215. <https://doi.org/10.1016/j.jpubeco.2010.11.007>
- Archer, M. S. (2000). *Being human: The problem of agenc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erry, J. W. (1997). Immigration, acculturation, and adaptation. *Applied Psychology: An International Review*, 46(1), 5-34. <https://doi.org/10.1111/j.1464-0597.1997.tb01087.x>
- Billett, S. (2006). Relational interdependence between social and individual agency in work and working life. *Mind, Culture, and Activity*, 13(1), 53-69. https://doi.org/10.1207/s15327884mca1301_5
- Boler, M. (1999). *Feeling power: Emotions and education*. Routledge.
- Bourdieu, P., & Passeron, J. C. (1977). *Reproduction in education, society, and culture*. Sage.
- Bucknell, K. J., Kangas, M., & Crane, M. F. (2022). Adaptive self-reflection and resilience: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rumination on insight as a mediator.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185, 111234. <https://doi.org/10.1016/j.paid.2021.111234>
- Clandinin, D. J., & Connelly, F. M. (2000). *Narrative inquiry: Experience and story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Jossey-Bass.
- Cooley, C. H. (1902). Human nature and the social order. In C. H. Cooley (Ed.), *Human nature and the social order* (pp. 179-185). Charles Scribner's Sons.
- Crocker, J., & Park, L. E. (2004). The costly pursuit of self-esteem.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30(3), 392-414. <https://doi.org/10.1037/0033-2909.130.3.392>
- Crocker, J., & Wolfe, C. T. (2001). Contingencies of self-worth. *Psychological Review*, 108(3), 593-623. <https://doi.org/10.1037/0033-295X.108.3.593>
- Durand, M., & Smith, C. (2013). The OECD approach to measuring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J. F. Helliwell, R. Layard, & J. Sachs (Eds.), *World happiness report (2013)* (pp. 112-137). http://unsdsn.org/files/2013/09/WorldHappinessReport2013_online.pdf

- Drydyk, J. (2013). Empowerment, agency, and power. *Journal of Global Ethics*, 9(3), 249-262. <https://doi.org/10.1080/17449626.2013.818374>
- Elizarov, E., Konshina, T., Benish-Weisman, M., Lee, T. K., van Ryzin, M., Vos, S. R., & Schwartz, S. J. (2023). Family functioning, well-being, and mental health among new immigrant families.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37(6), 806-817. <https://doi.org/10.1037/fam0001092>
- Giddens, A. (1979).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The MacMillan Press.
- Giddens, A. (1984).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Polity Press.
- Giddens, A. (1991). *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 Self and society in the late modern ag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Graham, C., & Nikolova, M. (2015). Bentham or Aristotle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capabilities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World Development*, 68, 163-179. <https://doi.org/10.1016/j.worlddev.2014.11.018>
- Ibrahim, S., & Alkire, S. (2007). Agency and empowerment: A proposal for internationally comparable indicators. *Oxford Development Studies*, 35(4), 379-403. <https://doi.org/10.1080/13600810701701897>
- Jung, C. G. (1953). *Psychology and alchemy* (R. F. C. Hull, Tran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44)
- Kymlicka, W. (1995). *Multicultural citizenship: A liberal theory of minority right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axwell, J. A. (2013). *Qualitative research design: An interactive approach* (3rd ed.). Sage.
- Meveigh, R. (2020). The body in mind: Mead's embodied cognition. *Symbolic Interaction*, 43(3), 493-513.
- Nikolova, M., & Graham, C. (2015). In transit: The well-being of migrants from transition and post-transition countries.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112, 164-186. <https://doi.org/10.1016/j.jebo.2015.02.003>
- Nikolova, M., & Graham, C. (2020). The economics of happiness. *GLO Discussion Paper*, 640, 1-34.
-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13). *OECD Guidelines on Measuring Subjective Well-being*. <https://doi.org/10.1787/9789264191655-en>
- Portes, A., & Rumbaut, R. G. (2001). *Legacies: The story of the immigrant second gener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Portes, A., & Zhou, M. (1993). The new second generation: Segmented assimilation and its variants.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530, 74-96. <https://doi.org/10.1177/0002716293530001006>
- Rawls, J. (1999). *A theory of justice* (Rev. e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Reay, D. (2005). Beyond consciousness? The psychic landscape of social class. *Sociology*, 39(5), 911-928. <https://doi.org/10.1177/0038038505058372>
- Riessman, C. K. (2008). *Narrative methods for the human sciences*. Sage.
- Rosenbusch, K., & Cseh, M. (2012). The cross-cultural adjustment process of expatriate families in a multinational organization: A family system theory perspective.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15(1), 61-77. <https://doi.org/10.1080/13678868.2011.646895>
- Ryan, R. M., & Deci, E. L. (2000).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and the facilitation of intrinsic motivation, social development, and well-being. *American Psychologist*, 55(1), 68-78. <https://doi.org/10.1037/0003-066X.55.1.68>
- Scribner, S., & Tobach, E. (1997). A sociocultural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mind. In E. Tobach, R. J. Falmagne, M. B. Parlee, L. M. Martin, & A. S. Kapelman (Eds.), *Mind and social practice: Selected writings of Sylvia Scribner* (pp. 266-28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en, A. (1985). Well-being, agency and freedom: The Dewey lectures 1984.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82(4), 169-221.
- Sen, A. (1992). *Inequality reexamin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en, A. (1999). *Development as freedo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en, A. (2008). The idea of justice. *Journal of Human Development*, 9(3), 331-342.
- Stein, D., & Grant, A. M. (2014). Disentangling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self-reflection, insight,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The role of dysfunctional attitudes and core self-evaluations. *The Journal of Psychology*, 148(5), 505-522. <https://doi.org/10.1080/00223980.2013.810128>
- Stone, A. A., & Mackie, C. E. (2014). *Subjective well-being: Measuring happiness, suffering, and other dimensions of experience*. National Academies Press.
- Schwartz, S. J., Unger, J. B., Zamboanga, B. L., & Szapocznik, J. (2010). Rethinking the concept of acculturation: Implications for theory and research. *American Psychologist*, 65(4), 237-251. <https://doi.org/10.1037/a0019330>

- Tanaka, S. (2015). Intercorporeality as a theory of social cognition. *Theory & Psychology*, 25(4), 455-472. <https://doi.org/10.1177/0959354315583035>
- Van Galen, J. A. (2017). Agency, shame, and identity: Digital stories of teaching. *Teaching and Teacher Education*, 61, 84-93. <https://doi.org/10.1016/j.tate.2016.09.009>
- Vransisca, V. (202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er social support and self-identity in adolescents at the SMAK Penabur Harapan Indah. *European Journal of Psychological Research*, 9(3), 1-7.

投稿收件日：2025 年 04 月 18 日

第 1 次修改日期：2025 年 07 月 06 日

第 2 次修改日期：2025 年 10 月 29 日

接受日：2025 年 10 月 30 日

